



| 政党政治与中国问题书系 |

王长江 主编

价值引导制度

社会和谐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蔡志强/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价值引导制度

社会和谐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蔡志强 / 著

▲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价值引导制度:社会和谐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蔡志强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0

(政党政治与中国问题书系/王长江主编)

ISBN 978 - 7 - 214 - 10835 - 7

I . ①价… II . ①蔡… III .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②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建设—研究 IV .
①D616②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4711 号

书 名 价值引导制度:社会和谐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著 者	蔡志强
责 任 编 辑	戴宁宁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pjh.com http://jspj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652 毫米 1/16
印 张	35.75 插页 2
字 数	49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214 - 10835 - 7
定 价	5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王长江

—

关于政党政治，1985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政党辞典》赫然解释为：“指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之间的斗争”。以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定义，会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但在30年前，这似乎更是一个基本共识。翻翻同一年代的书籍，几乎众口一词。在那个年代，我们总把“政党政治”与西方多党制联系起来，似乎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历史上的这种状态，是有其原因的。客观环境方面不论，就自身状况而言，大概和我们这类基本上按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政党的特殊性有关。政党源自西方，随着代议制民主和议会政治的成形而成形、发展。苏共模式的党则与西方原生态的政党迥然不同。它们既非产生于既有体制内部（在这一点上只与社会民主党类似），也不是要沿着体制内的合法途径获得政权（这一点和社会民主党也没有了共同性）。共产党的政权，乃是用领导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语）的政治革命的手段取得。这种“革命党”的特质，决定了它们

在理念、理论、行为方式、体制机制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革命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有其无可置疑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显而易见，在革命党状态下，党和政权之间是一种对抗、离心的关系，需要特别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以示与旧制度、与体制内政党的决裂，才能动员起推翻现存制度的足够力量。在这种现实面前，类似政党活动共同规律这样的话题，绝对是不合时宜的。

但是，执政后的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在执政条件下，党和国家政权之间是一种向心的关系。无论是在什么性质的国家，无论属于什么性质的政党，需要思考的问题，都变成了如何处理好和政权的关系，如何科学地控制公权力、运用公权力，获得更多人群的支持和认同。我们可以说，由于各种政党性质不同、能力不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深有浅，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有殊有同，但不能说，有的政党需要思考这些问题，而有的政党不需要思考这些问题。不管人们的好恶，政党活动，特别是政党的执政活动有了越来越多的共性课题，研究这些共性问题，探索政党活动的普遍规律，成为所有政党都要面对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种类型的党来说，顺应时代要求，转变观念，就成为特别重要的事情。如果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缺乏认识，继续停留在革命党状态，沉溺于自己的特殊性，往往容易使我们陷入一种夸大特殊性、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的思维，不屑也不善于吸收借鉴他人的经验。这不但妨碍我们深化对规律的认识，而且会使我们变得思想狭隘、僵化，结果往往是别人犯过的错误，我们仍然要犯；别人付出的代价，我们仍然在付出；别人吃过的亏，我们照吃不误。

如果说，在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和搞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走的毕竟是一条特殊的道路，和处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其他国家缺乏共同性，因而强调特殊性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状况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它使我们重新关注政党政治，而且不再是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来关注。

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待政党政治，我们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和理念。什么是政党政治？在我看来，所谓政党政治，即政党作为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政治运行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党介入到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政党政治最显著的特点。反过来说，只要政党在政治中具备这样的定位和功能，就都可以叫做政党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所当然地列在其中。

政党和民主政治相连。究其根底，政党不过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工具。其活动都围绕民主而展开：或者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或者把民主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我国属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党建立之时，虽然我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也正因为此，当我们党高高举起科学、民主的旗帜时，才获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政党围绕民主而运行，因推进民主而发展，这是政党政治不可更移的规律，也是政党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离开了这一点，便离开了基本航道，离开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二

作为把民众与公权力连接在一起的工具，政党政治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一方面，政党的首要目标（对相当一部分政党来说其实就是唯一目标）是控制公权力，政党活动因此而成为政治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政党是一种社会组织，表达和组织民意是政党的基本职责，因而又和社会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这个角度看，政党政治横跨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之间，是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研究。具体说来，政党政治的研究包含了以下基本范畴：政党与民众，政党与政权，以及既作为组织体又作为组合体的政党。

政党与民众。把所代表的民意输送到公权力的运行中去，是政党活动的起点。但是，正因为政党和民众是一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委托关系，引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需要研究。例如，政党不可能代表全体民

众。那么，它要代表多大比例的民众，才既有控制公权力的资格，又能有效地整合民意？在现实中，政党政治确实经常遇到这一矛盾。代表面过广，往往会在主张上显得庞杂、矛盾、不严谨而失去吸引力。代表性明确，却往往又因过于排他而大大缩小自己的支持面。这一矛盾，至今仍然是每个政党都要面对的一大困扰。又如，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或许是无可替代的，但作为工具，却正在遭遇其他工具（新兴媒体、民间组织等）的竞争。事实证明，政党不可能靠排挤它们为自己赢得空间，更不能利用政府的强力来压制它们的发展，而是不得不学会和它们和平相处、良性互动。对任何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政党与政权。在执政状态下，政党控制政权，这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无需研究的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公权力由于其自身特性，对政党既有强大的吸引力，也有强大的腐蚀力。这使得政党一方面要控制政权，另一方面又要和公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事实表明，若执政党和公权力毫无距离，固然能使公权力的运行全面体现执政党的意志，但是，公权力的腐蚀也会同时使政党变形，甚至使政党沉溺于权力，逐渐丧失政党作为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工具的作用。和公权力距离过远，当然会导致政党无法驾驭公权力，但距离过近，则会使得权力失控。总之，政党与公权力的距离和公权力运行的有效性之间，绝非简单的正相关关系。

政党。这里的政党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组织体的政党。每一个具体的政党，都是一个组织。作为组织，要有能够吸引成员的意识形态，要有能够发挥整体力量的组织状态，要有能够担当起职责的人才。这些本身便是值得研究的内容。事实上，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都是和它们要达到的目标相协调的，并随之变化而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是组织变革和改革的过程。当然，防止政党在变革过程中解体，同样是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二是作为组合体的政党。在这里，

“政党”只是一个被抽象出来的概念，作为“民众—政党—政权”分析框架中的“政党”，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中指的实际上都不是某一个具体政党，而是多个政党。这些政党构成政党体制，共同发挥连接民众与政权的作用。既然如此，什么样的政党体制能够最有效地履行政党的功能？在一些非政党（如社会组织、传媒等）开始明显地挤占政党一部分功能的情况下，政党政治如何运行？这些都是政党政治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这几对关系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政党政治研究的复杂图景。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看，问题更加复杂。事实上，这些关系从来都是纠缠在一起的。例如，政党不能只是准确地代表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因为，虽然这部分人的利益诉求可以非常明确，政党为之所做的奋斗也可以不遗余力，但如果这种诉求占量过小，政党就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掌握公权力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微乎其微。这里体现的是政党、民众、政权三者之间的复杂函数关系。又如，严密的组织形式可以使政党整体的力量得到充分体现。但是，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等级体系也往往容易使组织自身出现严重的官僚化，使被代表者诉求的输送变得艰难。这里体现的是组织结构、组织目标和民众诉求三者之间的关系。再如，获得了执政权的政党显然在赢得多数民众的支持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并不一定保证它始终如一地反映民意。相反，在缺乏公权力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公权力的腐蚀可能会使原本有着强大民意基础的执政党逐渐背离初衷，把公权力变成了营私的工具。这里体现的又是政党、公权力特性和民意的三者互动。

考察中国问题，同样离不开这些范畴。恰恰相反，因为过去研究不够，这些都应当成为我们深化研究的着力点。在我们看来，弄清中国政党政治，把握其未来走向，既要研究中国党自己的情况，也要下大力气研究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情况，更要在两者的比较中探寻政党活动规律性的东西。读者不难发现，本书系正像它的名称“政党政治与中国

国问题”所表达的那样，围绕这些方面而展开。

三

政党政治是一项现实性极强的研究。即使我们突出强调它的学术性，依然不能不带有直接的现实关照。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努力把理论性、学术性与正在进行的实践结合起来，更多地反映现实的要求。在我国，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这种关照十分必要。在研究中我们力求坚持以下原则，以在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体现理论和现实的有机结合。

第一，开放性。既然政党政治要探索的是共性、规律性的东西，就必须面向世界，努力摆脱过去的局限。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在走出了最初的盲目照搬阶段，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锤炼中获得了足够的自信之后，我们同时也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甚至一度把美国也列为学习的榜样。毛泽东关于“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那样的事情，在英美国家不可能发生”的著名的论断，就是在那时作出的。遗憾的是，后来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冷战兴起，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随之我们的思想、思维方式也逐步走向封闭、教条、僵化，过多的东西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且事实上，苏联模式排他性地成了我们唯一效法的模式。后来，我们和苏联也决裂了。从此，借鉴、学习几乎成了一个敏感的禁区，各种类型的国家和政党再无一国一党能让我们产生兴趣，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种完全封闭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变。随着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得到承认，我们开始放开眼界，先从肯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和经验开始，进而对其他类型政党的看法也越来越客观，最后形成了“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共同成果”的认识。这是一种很高的认识境界。但在实践中，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仍然对我们有着强大的影响，真正做到这一点尚有距离。

在开放性上,始终要处理好的一个关系是,既大胆吸收借鉴,又不盲目照搬。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开放不等于照搬。由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生存环境决定,任何照搬都不可能成功。非但性质不同的国家、政党之间无法照搬,即使性质相同、文化相近,照搬也是不可取的。同时,又不能因为怕照搬而不加区别地把他国他党的经验排除在外。实事求是地说,在我们的实践中,后一种错误发生的次数更多一些。

第二,包容性。包容是一种心态,是开放的前提。我们研究的课题,来自现实。现实中存在的现象,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对事实简单地回答是与否,无助于我们得出正确的认识。相反,理性地看待政党政治中的各种现象,研究其中的道理和规律性,从中获得启迪,才是我们的目的。这就需要我们有包容之心,有海纳百川的肚量。唯此,我们才会有更高的视野。我们以往的一个误区是,对纷繁复杂的政党一概以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正确与谬误分类,凡属后者,必先否定之,尔后再找依据。这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党思维。革命党思维有助于各社会阶层在阶级对决中进行意识形态“站队”,但对执政而言,这种“站队”显然过于简单化了。

包容不是对特殊性的忽视,更不是否定特殊性。相反,在深刻认识彼此特殊性的条件下,才有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包容恰恰是对丰富性、多样性的接纳。因此可以说,没有包容的心态,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开放,还会从好不容易得来的开放重新回到封闭状态。一个成熟的民族,往往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显示包容性的民族。邓小平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在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我看来,这里的“左”不是那种原本意义上激进的“左”,恰恰指的是那种排斥一切、把自己封闭起来的那种态度。它是近几十年来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三,前沿性。当今世界千变万化,是一个已经被人们用“信息社

会”命名的时代。借助新型媒介的力量，巨量信息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递，形成信息爆炸，使人们目不暇接。一种创新，今天看上去非常新颖、非常时髦，明天或许就会变得陈旧。政党政治亦如此。我们看到，政党政治发展到今天不过二百多年，但发生的巨大变化却是政党产生之初所想象不到的。政党不但遍及全球，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二十个国家不实行政党政治，而且类型更加多样，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即使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传统政党，也在适应新的变化，调整自己。继续用过去的眼光来看这些政党，不但难以获得正确认识，还可能得出贻笑大方的结论。显然，我们的研究要把握住当今时代政党政治的发展规律，就必须紧跟时代潮流，追踪政党活动的最新动态，了解政党政治研究的最新成果，努力体现对政党政治的最新思考。

讲求前沿性，不等于一味地求新求奇，被一些政党表面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的所谓创新所迷惑。这种情况，这些年来并不少见。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表现自己、炒作自己的平台，政党同样难以免俗。因此，在研究和探索中拨开表象，拂去喧嚣，抓住本质，是我们始终强调的，也是我们坚持的基本方向。

以上的话，是我对这套书系意图和思路的理解，希望能够在这套书中得到较好体现，得到读者的肯定和认同。如果读者在阅读之后能够有所收获，还能对内容提出进一步改进的意见，我们将不胜荣幸和感激。

是为序。

2013年10月6日

(王长江：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社会和谐：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命题	16
第一节 危机治理：走向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	16
第二节 治理框架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逻辑	59
第三节 变迁社会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科学形态	97
第四节 政党演进与政党价值观建构	113
第二章 政治认同：多元社会党的意识形态领导	128
第一节 正义之善：政党理念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128
第二节 思想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先导	158
第三节 多元社会的思想整合与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177
第三章 组织完善：和谐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载体	201
第一节 社会组织化与组织创新：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	201
第二节 基层党组织建设：党领导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	232
第三节 构建基层党建创新的动力机制：以张家湾等地的	

实践为例	258
第四章 制度建设：执政党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276
第一节 政党制度与政党现代化	276
第二节 执政科学化：制度框架内的政治运行新模式	300
第三节 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 统一	330
第五章 民主成长：构建党领导社会的保障机制	354
第一节 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实践与思考	354
第二节 协商民主：如何发展与保护社会	375
第三节 协商民主的实证研究：以浙江杭州为例	395
第四节 民主呼唤监督：人民主体地位的实践逻辑	411
第六章 机制运行：实现执政能力建设与社会和谐的契合	442
第一节 全媒体时代的社会沟通机制	442
第二节 党的群众工作：党领导社会的根本工作	481
第三节 创新社会管理：和谐社会中的治理机制	513
结语	538
参考文献	548
后记	556

绪 论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基础问题。在政党、国家、社会以及市场的互动系统中，社会和谐程度、社会发展水平始终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致力于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人们现实的需要联系在一起，落实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党通过一系列具体现实的发展目标，实现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有机结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同时也要看到，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制度不完善的基本国情，党的组织结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的剧烈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结合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形成推动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党建创新的有效制度。

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迈向现代化的大党，其领导实践就是为政治过程中的权力主体立法，为多元诉求主体提供价值导向和政治理想，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和民族复兴创造条件，提供有力的技术与制度

支持。本书阐述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要立足价值建构与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从实现、维护和发展人们现实的利益出发，探求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规律，寻求党的功能发挥及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现代政治中，执政党作为社会演进和秩序维护的核心组织，无疑是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领导力量。政党如何有效动员社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反映了政党能力。而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以及在不确定性极高的现代社会中的治理能力，则直接体现了政党的先进性和现代化程度。

孟德斯鸠 1748 年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小国经常被灭于外敌，大国则常亡于内乱。一个大国的繁荣富强有赖于其国民的精神和风气；一个强大社会的良序和科学发展有赖于强大的好的政府；而一个好的政府，在现代社会有赖于一个先进的政党的领导，并且直接表现为政党能否实现社会发展，保障人民权利，维护人民福祉，提供人民良好的发展环境。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直接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成效。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发展面临的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多元社会主体日益凸显的矛盾和冲突，对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党需要增强应对各种风险考验的能力和保障民生的能力，形成保障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实现利益协调和价值引导，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满足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新期待。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本书从“政党—政府—社会”互动角度对和谐社会建设中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进行研

究，建构党的社会治理理论和运行机制，形成党领导下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模式，提供党的建设科学化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路。

要考察社会和谐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逻辑起点在于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界定和对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毛泽东曾经说过：“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识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 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 60 余年、改革开放 30 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识一切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据，也是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命题。今天我们所讲的基本国情，最大的国情就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制度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的政策过程和社会过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过程，都必然要在这个基本国情的逻辑内运行，这是我们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现实基础。

当前我国正在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改革的攻坚阶段，社会发展面临以下基本情况：（1）社会从变革的框架转向建设的框架，发展的重点将实现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向全面协调综合的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转变。（2）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逐步实现从政策推动转向日趋完善的制度推进阶段。（3）社会从分化的发展转向整合的发展，从利益的失衡发展状态走向平衡发展状态，即实现从先富到共同富裕的过程。（4）中国社会传统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在保持动态稳定的同时，其利益关系、发展诉求和参与政治过程的能力和目标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阶级结构、阶层发展模式以及意识形态亦随之变化，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对执政党的政策过程和制度安排都提出更高的要求。（5）党对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领导逐渐从一元化的领导过程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治理模式转变。（6）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速度加快，执政模式从运动式的社会动员向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转变，党内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633 页。

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发展的局面加速形成，适合转型社会发展实践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的新的现代政党理念迅速成长。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将在新的逻辑下展开。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很好地解决了物质资源贫乏的问题，并逐步开始解决制度匮乏的问题。从十五大以来到十八大后的这段时间，中国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这一深刻变革，对政党执政能力建设、政党制度完善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路径、方法、外部条件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转型期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外压力，要求政党、社会以及市场在变化了的物质平台和政策目标下运行。此后的中国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个制度权威有效建构的时代，在法治渐趋完善的体系中运行。正确把握我国发展的国情和面临的发展环境，有助于我们更好剖析执政党能力建设的内在理路和实践逻辑。

亨廷顿指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① 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成长的过程，改变着党的决策过程和执政过程的外部环境和体制机制，并形成了多元的政策绩效评价标准，这些问题正在深刻改变着政党的执政模式和权力运行框架，对党的能力建设构成了现实挑战。

党的十八大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与公平正义紧密联系的，或者说，我们

^①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第 396 页。